

设提供坚实保障。而制度的规范化与清晰化,也将为法治教育与实务教学提供更具实操性的内容支撑,助力法治理念的普及与专业人才的培养。

参考文献

- [1] 朱云涛.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J].法制与经济,2020,(01):55-56.
- [2] 周乐军,周佑勇.规范性文件作为行政行为“依据”的识别基准——以《行政诉讼法》第53条为中心[J].江苏社会科学,2019(04):149-152.
- [3] 详见2020湘8601行初452号判决书.
- [4] 王春业.论附带审查中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识别[J].法治现代化研究,2019,3(02):105.
- [5] 戴秋.论规范性文件实体合法性的司法审查框架[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2,25(01):139-141.
- [6] 魏培培.司法建议制度的现状、定位与完善——以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为视角[J].山东审判,2016,32(04):56.
- [7] 戴秋.论规范性文件实体合法性的司法审查框架[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2,25(01):146-149.

A Study on the Mechanism of Drama Creation in the Northeast Liberation Area from 1945 to 1949: Theater Organization and Mass Participation

Yiming Yin Yanyan Xi

School of Media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00, China

Abstract

The dramatic creation in the Northeast Liberated Area from 1945 to 1949 was a highly organized and popularized artistic practice carried ou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is study finds that its creative mechanism closely followed the Party's policy orientation, achieving orderly management and efficient dissemination of dramatic production through the guidance of core platforms such as the literary supplement of the Northeast Daily, as well as the systematic organization of professional and amateur artistic groups. This enabled the masses not only to be recipients but also to become participants and performers in the creative process, thereby greatly enha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 It laid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China's artistic system.

Keywords

Northeast Liberated Area; Drama creation mechanism; Organization; Mass participation

1945—1949年东北解放区戏剧创作机制研究——戏剧组织化与群众参与

尹一鸣 席琰妍

哈尔滨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中国·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摘要

1945年至1949年东北解放区的戏剧创作,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的高度组织化、大众化的文艺实践。本研究发现,其创作机制紧密围绕党的政策导向,通过《东北日报》文艺副刊等核心阵地的引导、专业与业余文艺团体的系统组织,实现了戏剧生产的有序管理与高效传播。使群众不仅是接受者,更成为创作的参与者与演出者,从而极大地强化了社会动员与文化认同的效能。为新中国文艺体制的构建奠定了重要基础。

关键词

东北解放区; 戏剧创作机制; 组织化; 群众参与

1 东北解放区戏剧创作的组织化体系

东北解放区戏剧创作的本质,是一场高度组织化的政治文化实践。其实践机制通过党政系统、团体网络与传播媒介的三重架构,被系统整合进社会革命的总体进程之中。

1.1 党政领导与政策导向

戏剧在此被赋予明确的政治属性,成为社会动员与意识形态建构的关键载体。这一根本定位源于党对文艺工具属性的清醒认知——“文艺为政治服务”。当《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在东北全面贯彻时,“为工农兵服务”不再停留于口号,而迅速转化为具体的创作指令与审查准

则。党的宣传文化机构深度介入创作全流程,从主题确立(土改、支前、生产)到人物塑造(阶级立场),再到语言风格(大众化),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导向机制。这使得戏剧舞台成为政治话语的形象化展演,创作本身则成为政策诠释的标准化作业。这种深度绑定,在确保文艺与革命进程高度同步的同时,也重塑了艺术家的创作思维与表达路径——个人艺术探索如何与集体政治诉求相协调,成为那个时代留下的永恒命题。

1.2 文艺团体的组织与运作

组织化的理念依托于实体机构的高效运转。其核心是专业文工团与基层业余演出队构成的双层网络。专业团体(如东北文工团、鲁艺文工团)作为艺术骨干与创作中心,承担着示范演出、剧目推广与指导基层的任务,其活动完全服从于整体的宣传部署。更具社会渗透力的是遍布工厂、村

【作者简介】尹一鸣(1981—),男,中国黑龙江哈尔滨人,硕士,讲师,从事戏剧表演研究。

庄、连队的业余组织。在“群众化”方针推动下，工农兵从观众转变为创作主体。专业团体提供“剧本框架”或进行艺术辅导，群众则注入自身的生活经验与情感进行再创造。这种“专业引导与群众创作相结合”的模式，构建了一张极具活力的生产传播网络。排练与演出过程，本身就是一场生动的集体政治实践与情感动员，业余剧团由此成为凝聚基层社会的新型组织细胞。

2 东北解放区戏剧创作的内容生产与主题导向

东北解放区的戏剧创作，在内容与形式上形成了一套高度服务于现实政治需求的独特体系。其核心特征体现在主题选择的高度政治化、创作过程的集体化倾向，以及艺术形式为达成大众化目标所进行的融合与创新。

2.1 主题与题材的政治化选择

解放区戏剧在题材上呈现出与政治任务高度同步的特征。土地改革、支援前线、生产建设等现实中心工作，直接构成了舞台上的核心叙事。戏剧不再仅仅是对生活的摹写，更被要求成为推动政策落实与社会变革的催化剂。例如，以诉苦翻身为主题的剧目，通过展现农民从蒙昧到觉醒的历程，为土地改革提供了生动的情感动员与道义合法性阐释；而那些歌颂战斗英雄与劳动模范的作品，则致力于塑造符合新政权价值观的理想人物典型，为社会成员提供清晰的行为范式。历史地看，这种集中实为战争与革命环境下的一种文化战略选择——它主动舍弃了题材的广泛性，以换取宣传力量的集中与思想动员效力的最大化。

2.2 创作模式的集体化倾向

“集体创作”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生产方式。其典型流程是：专业文艺工作者带着初步构思深入基层，与工农兵群众共同讨论、修改和丰富作品。群众贡献生活细节与真实感受，专业人员负责艺术提炼与结构整合。在工人戏剧领域，这一模式表现得尤为彻底——工人们自编自演，将车间里的日常与生产竞赛的热情直接搬上舞台。

这一模式深刻改变了创作的本质。艺术生产从个人化的灵感抒发，转变为一种公开的社会化协作过程。其背后的理念在于坚信：最真实的生活与最正确思想，必须通过集体智慧的碰撞方能充分捕捉。这种创作方式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现实感召力与政治针对性，观众在舞台上看到的仿佛就是自身生活的写照。集体创作作为一种高效的政治宣传机制，其艺术本体价值的长远发展，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命题。

2.3 艺术形式的融合与创新

为了让新思想、新主题有效地抵达广大民众，戏剧工作者对艺术形式进行了大胆的改造与创造。传统的民间艺术资源，如二人转、秧歌、地方小调等，因其与民众审美习惯的天然联系而被广泛吸收利用。同时，话剧的戏剧性结构、歌剧的音乐表现手法也被有机融入，催生出“秧歌剧”等新的

综合形态。

一切形式探索均紧紧围绕“大众化”这一核心目标。语言力求通俗口语化，摒弃艰深修辞；表演风格追求朴实真挚，贴近生活原态；舞台美术往往因陋就简，注重演出本身的流动性。这种形式上的“杂交”与简化，其根本目的并非艺术上的标新立异，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接受门槛，提升政治信息的传播效率。这种以传播效能为首要考量、扎根民间审美土壤的形式实验，其历史意义在于切实打破了戏剧与民众之间的隔阂，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群众文艺”。

3 东北解放区戏剧的传播网络与演出实践

3.1 多元化传播途径的构建与效能

戏剧的生命在于传播。1945-1949年的东北解放区戏剧工作者深谙此理，他们构建了一张超越传统剧场空间、触及社会各个角落的立体传播网络。舞台演出无疑是其中最直接、最具感染力的形式。专业文工团承担着巡回演出的重任，他们的足迹遍布前线与后方。一辆大车拉着简单的布景和道具，队伍就能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一片打谷场、一处祠堂空地，随时都能化为临时舞台。这种流动性极强的“送戏上门”，打破了艺术传播的地理限制，让戏剧得以深入社会的毛细血管。

3.2 演出实践的群众性及其政治仪式功能

倘若演出仅仅停留在“专业演、群众看”的层面，其影响力恐怕会大打折扣。东北解放区戏剧实践的深层力量，恰恰源于它将演出过程本身，转化为一场群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政治仪式。

舞台从庄严的剧场挪移到沸腾的工厂车间、宽敞的村头场院、乃至行军途中的营地。空间的转换消解了艺术与日常生活的隔阂，观演关系也随之重塑。观众不是正襟危坐的旁观者，他们常常是工友、乡亲或战友，与台上演绎的故事血脉相通。当台上演出控诉地主恶霸的罪行时，台下可能就坐着刚刚翻身的农民；当歌颂劳动竞赛的鼓点响起，观众席里不乏生产突击队的成员。这种情境的代入感与共鸣感，是封闭剧场难以企及的。

更具特色的是“群众演群众”的模式。业余演出队上演自己编写的故事，演员就是身边的普通人。演出不再是单纯的表演，而成为一种集体的自我表达与自我教育。观看者可能在下一场演出中就成为参与者，这种身份的流动性彻底激活了群众的主动性。

4 东北解放区戏剧创作的群众参与

4.1 作为创作主体的群众

传统戏剧创作往往被视为文人或艺术家的专属领域，但在东北解放区，这一界限被有意且有效地打破了。群众不仅仅是等待被描绘的客体，更成为叙事建构的主动参与者。这一转变如何实现？其核心在于一套制度化的“从生活中来，到创作中去”的引导机制。专业文艺工作者带着任务下